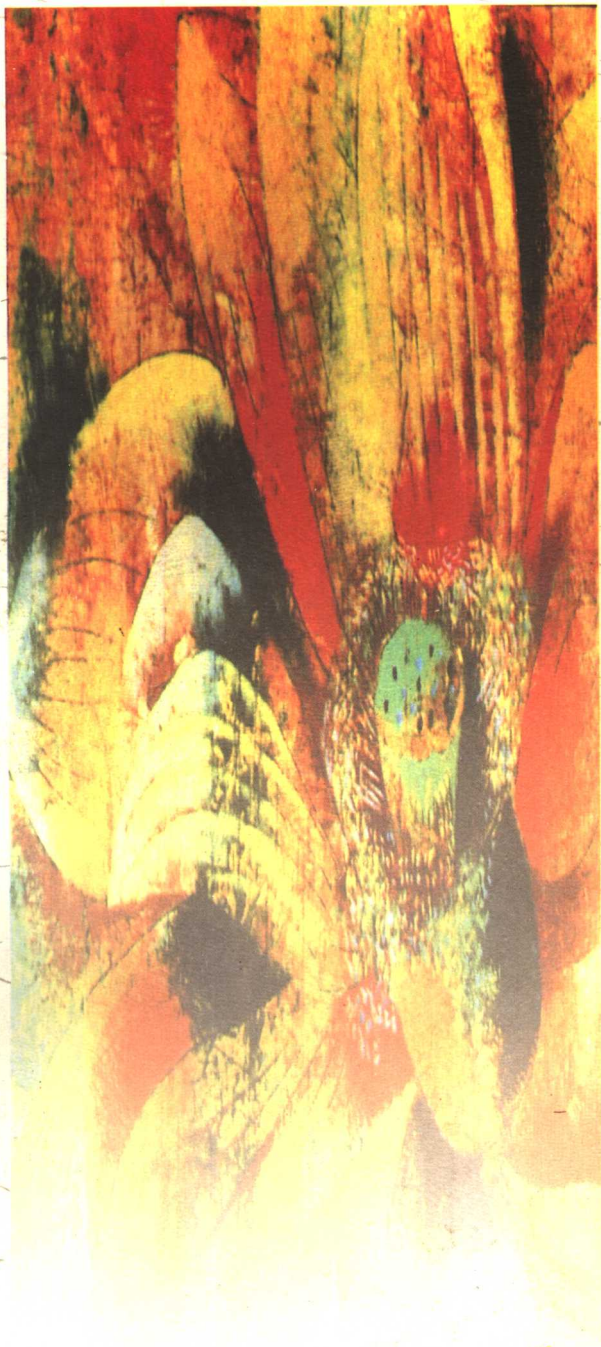


追寻与创建

——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



李少群
著

追寻与创建

——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



李少群
著

追寻与创建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

李少群 著

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经八纬一路 321 号

出版日期：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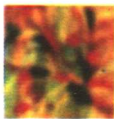
用纸规格：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10.5 印张 4 插页 225 千字

制版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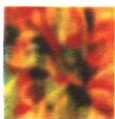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7-5328-2495-0/1·78

定 价：12.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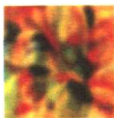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本书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作为一个多元的、相对开放的结构,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内中从社会、文化透视与美学分析相参融的角度出发,以典型作家和典型文本的剖析,带动对女性写作整体风貌的考察。本书认为,现代女性文学传统产生于女作家与所处的社会之间一方面与文化大目标相融合、一方面又时而反观审视自身的持续演进的关系之中。作者深入探索了现代女性对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她们的心灵之声和心路历程;着力抉示了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一批重要作家在艺术方面有别于男性中心传统的追寻与创建,独有的文化哲学底蕴、文本构成特征、艺术想象力与创造性、创作意识与语言文体……;展现了现代女性创作对妇女解放的不断追求,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入确立,女性审美自由和艺术形式规范的不断拓展与丰富。



29/5/2002



责任编辑:朱晓晨
装帧设计:刘小军

作者简介:

李少群, 1954年生于青岛。197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著有《李广田传论》《新文化精义》等著作。



引 言

人类进入 20 世纪后，妇女文学也进入了世界性的多元发展时期，并且日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在不同的国家，在地域、种族、历史和文化背景相异的情形下，其发展的状况则各有差别，其所关注的立场、角度和视野也自然不同。从女性文化视角而言，欧美国家的女性写作——这里主要是指六七十年代西方再度兴起的女权运动中和这运动之后的妇女文学（通称作女权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作为边缘意识形态倾向，它是社会高层次文化批判的产物，属于女权运动的一部分，女权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两个概念也同时包含其中。它们在总体上具有相对系统的写作理论和写作谋略，在其发展、

引

言

演进的大部分历程中，沿着反抗与消解贬低妇女的男性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方向前进，向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发出挑战，有着浓厚的性别政治色彩和强硬的抗争姿态。同时它们的理论和实践也仍是多元的和持续发展的。今天的西方文化界，有关女性主义、女权文学的理论业已经过了从单纯强调女性权利、男女对立的二元思维到超越两性对立结构的后现代女权观念等各个发展阶段。这些带有不同国家、民族和写作流派特点的理论观念及文学实践，在大文化框架下次序延展又互相渗透，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时间内，构成了当今世界相当活跃炫目的女性主义文学局面。

中国现代的妇女文学和西方女权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相比，在内质上既有共同性也有着根本的差别。简要地说，其共同性便在于都是植根生存于同一个地球，是有着近似的历史命运和文化、生存处境的女性叙写，都是将写作视为女性精神自我拯救的一个重要途径。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几度高涨，都与西方一定时期内女权运动的升温隐约相关，这也证明了中国妇女文学同样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格局之下。同时由于女性主体精神的逐渐生成，在男性中心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中，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也必然地涵有女性主义的因素，必然体现着要求独立、平等的女权意识的萌生与增长；而女性生存体验和生命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表达，女性语言建构的寻觅和实现，也同样带来了女性审美自由的不断拓展和女性艺术形式的走向丰富。

但是，现代中国的女性写作，从它的总体性质来讲，还还不能冠之以女权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它与后两者毕竟又有着诸多根本的不同。对其，应该称作是有着自身样貌

和传统的女性文学。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牵涉到历史和文化的许多方面。这其中既有因社会物质文明积累的程度差异、国家之间社会经济和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导致的不同的文化发展速度和模式，又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到民族心理深层结构而造成的自身文化、文学的特点等种种因素。其中还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在中国，倡导女性各种应有权利的妇女解放观念，从未生成为自发的、独立的争取女权运动，或是单独的妇女解放运动；换言之，就是中国女性百年以来的求自由求解放，从微弱细小的呼喊汇聚成高亢激荡的潮声，一直是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涛流中回荡喧涌。中国妇女从未有过自己独立的行动纲领和生存宗旨，因此现代女性写作不可能像西方女权或女性主义文学那样，以全面更新的思维和自我界定，进行文化话语的渗透，并赋予其鲜明的性别政治意义。

中国近代最早发出的为妇女鸣不平的呼声，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年间。当时有少数思想先进的文人倡议将妇女从缠足、“无才即德”等封建陋习中解脱出来，甚至主张女子参政。这一方面是基于人道的良知，同情于广大受压抑的女子，另一方面是有感于封建社会晚期颓朽糜浮的弊政和风气，意在整饬病态深巨的社会风俗制度。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人们这种主观的愿望和客观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封建传统基石的开始动摇，预示了社会性变革的临近。鸦片战争后，大受刺激的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国势日丧的危机感和西方文明的比照下，其强种救国的呼声日益高亢。改良妇女地位，提高妇女素质，鼓励女子自立，谴责对女性的愚昧欺压

和礼教幽禁等言论观点，被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清晰地纳入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框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兴国强民，并不全然是出于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认定与信仰。在这个阶段，除了在一些通俗文艺形式如弹词中，能偶尔听到女性直接发出的怨愤之声，关于妇女问题的要求与主张基本都是由男性提出的。进入 20 世纪，才开始逐渐出现由妇女组成群体直接起来争取自由平等的现象。1903 年，在日本的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们曾组织了一个叫“共爱会”的妇女组织，这是当时积极倡扬救国和女权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女性团体。“共爱会”的宗旨这样写道：“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尽女国民之天职。”^①西方女权主义者强调的是女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对男性中心秩序的反叛与颠覆，而中国最早的女界先锋强调的是女性与男人对国家同样的负有责任和义务。女子要求独立、平等的目的，是能够做一个尽职的“女国民”。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的进步人士对于妇女解放的共同认识。而习惯了以家庭为整个生活天地的中国女子，在固有的文化环境中，更易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思维定势。一旦觉醒，她们最先焕发出的也仍是济世拯民的热忱，其坚贞绝烈绝不弱于男子。从“共爱会”到辛亥年间的秋瑾，在负载着千百代女性憧憬的她们看来，“男女平等”便首先意味着要求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独立。要转向外界，通过接受教育和包括男性在内一起从事工作，才能使妇女日益觉醒并获得人的尊严。这种积极入世的心态与中国比较注重群体的文化与历史积淀有相当关

^① 见《中国妇女运动史》，37 页，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联,这也影响了“五四”后先进女性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见解。

现代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的浪潮前所未有地汹涌着,同时前所未有的,是时代女作家群的崛起,从此开始了中国女性主体叙说的现代历程。这时的妇女解放,当然地置于社会时代变革的主题之下,属于民主革命的大目标。刚刚兴起的现代女性文学,也必然会受到社会哲学和社会历史变革现状要求的制约,这又同时暗合了中国近、现代女作家共有的趋赴社会需要的革命情结。

这就是现代女性文学经由历史积累和时代制约下的一种内在的特质,并由这种特质形成了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学风貌。它基本呈现了这样的文学传统,即它衍生于现代女作家与她们的社会之间(包括政治、文化、伦理)时而与社会大目标相融合、时而返顾自身的一种持续演进的关系之中。就是在这样的总体追求中,女作家们经由内心世界表现了艺术上的求索与建构。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荦荦伋立于传统的写作规范和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文学之间。它就是它自己,任何研究形式和文体规范,都一时很难适应它。然而或许正因为此,它的实体边缘,可以更自由地向两侧伸延。一位当代知名女作家说得好:“女性文学可以开拓的空间绝对比‘女性主义文学’更为宽广。”^①谈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写作均受到民族、国家作用的影响,一名女性研究者的一段话,可以

^① 李昂:《开启一片女性写作天空》,见《作别张爱玲》,16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给人很多启发：“……它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本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所有非工业文明国家中的妇女生活，不同程度地解放或改造了妇女。自1975年‘联合国妇女十年’以来，妇女与国家的关系正日益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重要命题，亦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结构变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及时地整理和总结中国妇女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①文学自然不同于社会学，但其内质仍互相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上述例中不以西方妇女运动模式为分析的依据和主体，同样，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也应该避免完全以西方女权文学理论来作生硬的套解，而应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出发，吸收女权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将历史、阶级、文化及性别等因素熔入阶级分析，将女性文学放入不受传统意识束缚的更广阔的阐释空间，去总结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自身的规律。从本体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不须像西方女权文学处于同期阶段时那样出于性别意识而担负政治承诺，但它却从来不乏与男权传统的外部世界在抗争中寻求两性合作的意愿和勇气，尽管距离真正的合作仍需长久而艰辛的努力。正是女性话语与社会时代主题相整合又相交错，推演出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行进轨迹。或者说，这即是中国女性文化在现代大文化背景下的集体经历。只有正视这一点，我们对此才能获得或许比较近于全面的观照视角。而对照联系西方后现代女权主义目下推翻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指出双方处于同一个话语体系的权力结构之中的观点，则当有助

^① 李小江等编：《性别与中国·序》，北京，三联书店，1994。

于我们以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反观中国女性文学，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是怎样丰富与拓展了已有的传统。

“不排除任何学科，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为我们提示和开辟了这样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所谓女性文学研究缺乏固定的理论模式和合理定义恰恰成了人们不断开发新理论、探索新方法的有利因素；任何绝对的、单一的权威和权力中心已不复存在，语言学、艺术史、人类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将赋予文学研究跨学科的性质和创新意识，使文学批评成了不再作为文学作品附属物的创造和再创造的活动。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新的天地。女性文学，是女性诗意的存在，是其自我精神拯救的一个重要途径。女性多元化、多层面的自主品格的显现，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形态不一，女性对自身的探索同样充满了欣悦、碰撞、断绝与矛盾。女性的写作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包括女性所有的挣扎、坠落、迷失与拯救，只要是真实的女性心态的撕呈与表述就应被珍视——无论是冰心新文学创作的哲学根柢和文化理想的架构，丁玲所呈现的高贵、深沉的文学品性和博大的人性关怀，还是萧红作品尖锐警醒的女性主义立场和对存在命运的深入体认，张爱玲于时代变迁之际在意象与反讽中对文学意义世界的重建，还有庐隐、凌叔华、郑敏……所有这些永远闪耀着深挚情感和智性光辉的女性，由她们所代表的中国女性一段精神形态和精神历程，将伴随着我们，走过现在和将来的岁月。

目 录

[1]	引言
[1]	第一章 现代女性文学与“五四”新文化思潮
[1]	一、女性“失语”与“女性的发现”
[12]	二、现代女性文学的时代精神
[31]	第二章 反封建主义的激流
	——女性主体意识进展
[31]	一、对旧伦理道德的反抗：女性话语及其双声语境
[46]	二、男权意识网络的女性观照：文化模式诘难
[73]	三、返回自身：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与深化
[94]	第三章 悲幻与抗争
	——女性感伤文学
[94]	一、时代女性的感伤情怀
[110]	二、穷究生命的底蕴：庐隐的悲剧意识
[126]	三、成长的感伤：《棘心》的多重意指系统

[140]	四、人格自塑与外部交流的统一：自叙传方式
[147]	第四章 女性关爱的诗意呈现·冰心
[147]	一、自然·童心·母爱 ——爱的主题与隐喻
[171]	二、冰心的创作及其女性文化底蕴(一)
[189]	三、冰心的创作及其女性文化底蕴(二)
[199]	第五章 女性革命文学·丁玲
[199]	一、超越自由与尊严：革命洪流中的女性写作
[216]	二、丁玲：向着“最大可能意识”开拓
[239]	三、丁玲心态与其创作的两性性
[250]	第六章 更深地潜入存在的命运·萧红
[250]	一、社会大视野下的女性开掘与突进
[263]	二、萧红的创作：乡土叙事与荒野之歌
[280]	三、萧红的文体
[290]	第七章 都市女性话语·张爱玲
[290]	一、都市时空的多方位体验
[299]	二、急管哀弦下的生之苍凉 ——张爱玲的人性世界
[311]	三、张爱玲的艺术独创
[322]	主要参考书目
[325]	代跋

第 1 章

现代女性文学与“五四”新文化思潮

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张爱玲《忆胡适之》

一、女性“失语”与“女性的发现”

出现于 20 世纪初叶现代中国的女性文学，是当时“五四”新文化思潮下“人”的解放和“女性的发现”的产物，

也是晚清数百年来，人们不懈地推动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它的根芽，则孵育于所有的那些女性失语的年代。

下面是出于男子之手的有关封建时期和近代社会女子状况的两则论述资料——

其一，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妇女》篇中指出当时的社会是如何对待妇女：“……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予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

其二，现代一学者根据清末官员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有关其妻、妹行止的记载，如此转述并评议当时上层社会妇女的生活：“曾纪泽是著名的外交家，通英文，通西学，贵为袭侯，他的夫人能够嫁到这样一个丈夫，并且能远涉重洋跟着丈夫到欧洲去当公使夫人，在当时妇女中已经是难得的幸运了。可是她身在欧洲，始终还是中国的‘男女之大防’的牢笼中的女囚徒，不要说不能参加驻在国的一切男女一堂的社交活动，甚至在巴黎她和曾纪泽之妹姑嫂二人去参观游览，也必得选一个没有游客，碰不到男人的日子。时为光绪五年正月二十日，亦即公元1879年2月10日，地为巴黎，法国女革命家高洁丝的《妇女权力宣言》的发表

(1789) 已经 90 年了。”^①

前者详尽写出了封建专制对妇女百般非人的禁锢与残害，衬出了女性的万斛哀怨。

后者则说明了这类禁锢一直延续在近代社会的事实和它异常的森严状与顽固性。

正是这一切，以及无数隐没在它们背后的有记载或无记载的事实，组成了中国女性群体缄默、喑哑的历史。

在这些事实之中，也包含着本书将要论述的女作家们最初的人生经验内容。如冰心（谢婉莹）、苏雪林、袁昌英都以文字追述过自己的母亲在家族生活中被歧视和压抑的经历；而庐隐、冯沅君、丁玲、关露都系幼年丧父，寡母携孤将雏抑怙踟躅于世间的苦况，更是她们永难磨灭的生命记忆。平生际遇坎坷的白薇，少年时代即遭受封建婚姻暴虐的摧残；家长制下的包办婚姻制度，也曾在冯沅君、苏雪林、丁玲、萧红和谢冰莹等人心上留下过深浅不一的伤痕。就这样，通过上一代女性也通过她们自己，女作家们在踏入创作人生之前，都曾体验过女性生活中无告的悲凉与创痛。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束缚妇女的人性和道德枷锁，无疑同时也是加于女性文学创作的桎梏。特别是封建中晚期的社会，以家庭为中心、以“三从四德”为终身行为准则和言行范围的妇女们，外在的约束和规范大半已化为内心的自律，使她们即便在闺中自娱式的诗文创作中，也极少能表达或者说无以表达出真正的女性心声。清朝一位女诗人曾收集了近

^① 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导言》，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